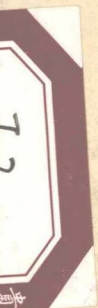


批判朱熹文集

福建省图书馆编印

一九七四年六月



目 录

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……………罗思鼎 (1)

伪君子朱熹和两面派林彪

……………武汉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 (10)

评朱熹的“待人哲学”

……………武汉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大批判组 (18)

朱熹及其理学是什么货色

……………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
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史 宏 (28)

朱熹的亡灵挽救不了林彪必然灭亡的命运

——批判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

……………林可济、穆克宏、范启龙 (35)

朱熹是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

……………福建师大政教系大批判组 (42)

略评朱熹……………黄佳耿 (58)

朱熹和他的待人哲学

……………江西婺源县文化站写作组 (68)

评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

.....上钢五厂工人 茅森妹 (79)

林彪为什么欣赏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

.....西北大学 林剑鸣 (84)

批判朱熹在泉州地区的流毒.....海 泗 (86)

资 料

朱熹..... (90)

四书..... (90)

程朱理学..... (91)

朱子语类..... (93)

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

罗 思 鼎

朱熹（一一三〇——一二〇〇年）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。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，发展了孔丘、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，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。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。他对《五经》的解释，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。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，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、搞复辟，对朱熹也十分崇拜。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《四书集句》作为《四书集注》的续篇，叫嚣“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”。因此，要深入批林批孔，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。

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，演变成为理学，又称道学。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，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。

在宋代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，是怎样看待“理”和“气”的关系问题。“理”就是观念、思想，“气”就是物质。朱熹认为“理在先，气在后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）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，万事万物，大至天地，小而蝼蚁，都是由“理”派生出来的。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：天上有一轮明月，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。

“理”就是这个月亮，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“理”

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。

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。客观世界决不是“理”的影子，而朱熹的“理”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。朱熹说：“帝是理为主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）这就是说，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“理”的体现和化身，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：“**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‘神人’，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。**”（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》）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。他所以要提出“理”的观念，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、压迫有理，造反无理。说来说去，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。林彪所说的“受于天”的“理智”，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。

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。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，鼓吹反动的“天命”论，强调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反动统治秩序。到了汉朝，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，竭力宣扬“天人合一”，并制订了“三纲五常”的反动教条，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。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，鼓吹“天命即是天理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四六）而“三纲五常”则是这种“天理”在人间的体现。这个“理”，“其张之为三纲，其纪之为五常。”（《朱子文集·读大纪》）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“三纲之要，五常之本，人伦天理之至”。（《朱子文集·垂拱奏劄》）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，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，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“三纲五常”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包的，是支配世界的原则，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“合理”。

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，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“天理”的，而且是永恒不变的。他胡说什么“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”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四）即使是“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，毕竟理却只在这里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）其实，无论是孔丘的“天命”，还是朱熹的“天理”，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“合理性”和“永恒性”。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，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，叫嚣“顺天者兴，逆天者亡”，还胡说什么“这是辩证法”。看，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！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，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。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，也还需要欺骗自己。不然的话，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。

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“天理”命定的，叫嚷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归根到底，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。朱熹公开声言“佃户不可侵犯田主”，要农民“各依本分，凡事循理”。农民如果敢于“鼓众作闹”，起来造反，那就要吃官司，坐班房，“决配远恶州军”。（参见《朱子文集·劝农文》、《朱子文集·劝谕救荒》）朱熹还叫嚣说，凡是敢于“以下犯上，以卑凌尊”、“以地客杀地主”者，一律严加镇压，决不宽恕。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“悖逆作乱之心”，维护“三纲五常”，使“天理”不至于泯灭。（《朱子文集·戊申延和奏劄》）由此可见，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，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。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，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，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，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。

二

朱熹从“天理”是事物的本源出发，形成了他的以“格物致知”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。

朱熹所说的“物”，并不是指客观存在，而只是“理”的影子。因此，他说的“格物致知”，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，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“天理”。他明确提出，“格物致知”就是“穷天理，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世故”，（《朱子文集·答陈齐仲》）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，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。所谓“格物致知”，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，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；对被统治阶级来说，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。

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，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，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，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，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。毛主席在《实践论》中指出：“人的认识，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，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、自然的性质、自然的规律性、人和自然的关系；而且经过生产活动，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。”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，认为人是“理”所派生的，人心就反映着“理”，因此，“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”，（朱熹：《大学章句》）“人心”能够领悟“天理”。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，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，说什么只要“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就能到达“一旦豁然贯通”的境界。换句话说，人们根

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，就能逐步领悟“天理”，最后“忽然爆开，便自然通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）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。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“要解决问题，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”。照这种说法，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，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，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“爆发”一下，就可以百功齐备、万事大吉了。

朱熹宣扬“格物致知”，目的是为了“治国平天下”。朱熹说：“致知格物，是穷此理。诚意正心修身，是体此理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只是推此理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五）总之，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，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，遵守封建秩序，维护封建专制制度。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关键就是要“居敬”。朱熹说：“敬字工夫，乃圣门第一义。”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都少个敬不得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为什么“敬”字这么重要呢？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。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，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“三纲五常”，不得有半点怠慢、放肆和动摇。对劳动人民来说，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，“内无妄思，外无妄动”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把自己手脚捆缚起来，就象“放在模匣子里面”一样。朱熹得意地吹嘘：“修己以敬，下面安人安百姓，皆由于此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这几句话，充分暴露了所谓“敬字工夫”的反动本质。

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“修养”经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。朱熹打着“敬”字的幌子，大搞形式主义，甚至专门规

定了一整套“敬”的规矩，什么“坐如尸，立如齐”啊，什么“头容直，目容端”啊，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二）连走一步路，抬一下手，都要毕恭毕敬，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！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“敬字工夫”，鼓吹“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”。但是，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，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，男盗女娼，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这就是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。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，行打击报复之实，为了打击反对派，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，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。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：“道学先生是躬行‘仁恕’的，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，他就也不能仁恕。所以朱子是大贤，而做官的时候，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。”（《论俗人应避雅人》）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“道统”的伪君子，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，企图占为己有，用粗绳捆缚孔子“圣象”，强令“搬家”，结果把孔“圣人”的手脚都搞断了，闹得舆论哗然。什么“敬”啊，“忠”啊，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。明代李卓吾曾骂道：“真个道学，脸皮三寸”。（《世说新语补》卷四）宋朝以后，“道学先生”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。

反革命两面派林彪，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。孔丘说什么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朱熹进一步鼓吹：“父子相隐，天理人情之至也。”（《四书集注·论语·子路》）林彪将这几句话收录在他的《四书集句》中，奉为信条。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”的逻辑，露骨地宣称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”。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“亲亲、尊尊、长长”之道办事，倒是供出了一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。朱熹曾公开鼓吹：“亲者重而疏者

轻，近者长而远者短。”（《朱子文集·经筵讲义》）十分清楚，朱熹的“待人”哲学，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。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，是为了结党营私，纠合一小撮死党，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。原来，他口口声声要学的“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”的哲学，说穿了，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。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”，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豺狼阴险。

三

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，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，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。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，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，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。汉代董仲舒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“王权神授”论制造根据。但是，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，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，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。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，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。唐代的韩愈，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，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，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，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。《宋史·道学传》指出，孔孟之道的“正统”，“至（朱）熹而始著”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，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。”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

的反映。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“四权”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“天理”，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。

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，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。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。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，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，“小民田日减”，“大官田日增”。（《宋史·食货志上》）社会危机加剧，农民起义接连不断，提出了“均贫富、等贵贱”的革命口号，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，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。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，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。

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，王安石曾以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的精神，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。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，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“天命”论；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，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。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。朱熹大骂王安石“全不用许多儒臣”，“其术足以杀人”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〇）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，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。陈亮说：“夫道之在天下，何物非道，千途万辙，因事作则。”（《龙川文集·与应仲实》）他认为“道”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，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。这是和朱熹的“理在气先”、“格物致知”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。因此，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，不由得惊呼：“陈同甫（陈亮字）学已行到江西，浙人信向已多，……可畏，可畏！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三）这种情况，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

斗争中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，绝对没有任何折衷、调和的余地。

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。正因为这一点，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，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。宋理宗即位后，读了朱熹的书，大发感慨地说：“朕读之不释手，恨不与之同时。”追封朱熹为“太师”，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，而把朱熹的牌位抬进了孔庙。从此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。正如鲁迅所指出：“汉朝以后，言论的机关，都被‘业儒’的垄断了。宋元以来，尤其利害。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，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。除了和尚道士，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，其余‘异端’的声音，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。”（《我之节烈观》）

从孔丘到朱熹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，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。直到今天，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。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，就是一例。因此，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，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，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、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。只有这样做，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！

（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伪君子朱熹和两面派林彪

武汉大学历史系大批判组

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：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，“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”。（恩格斯：《论住宅问题》）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也不例外，他为了制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，也不得不回到他的“前辈”那里寻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。他从孔老二那里找到了“克己复礼”，于是就大书特书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。”他又从朱熹那里找到了虚伪的处世哲学，于是就在他的反党黑笔记里写道：“我常考虑，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。”关于林彪为什么要抬出孔老二这具僵尸？已有许多文章作过分析和批判。我们在这里要着重分析、批判的是林彪为什么对朱熹的处世哲学如此欣赏？这只要对朱熹的反动思想稍加剖析，把朱熹与林彪的反动言行略加对照，问题便昭然若揭了。

林彪所欣赏的朱熹，何许人也？

朱熹（公元一一三〇——一二〇〇）是南宋儒家的代表和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也是孔孟之道忠实的维护者和系统的阐发者。《宋史·道学传》说：孔孟之道，到了朱熹手里，才变得名声更大，影响更深了（“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”，“至熹而始著”）。

朱熹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的时代。当时社会矛盾空前加深，地主阶级日益衰落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“一年多如一年，一火（与伙通用）强如一火”^①。北宋王小波、李顺起义，方腊起义，南宋初年钟相、杨么起义先后提出了“均贫富”、“等贵贱”、“是法平等，尤有高下”等鼓舞广大农民、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口号。这些口号的提出，标志着我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。这对西汉儒家代表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，是一次巨大的冲击。宋朝的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的思想、政治危机。就在这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年代，朱熹顽固地站在守旧、复古、倒退的反动立场上，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，对儒家学说精心地做了阐微补缺的工作，形成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理学，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和挽救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凶恶的思想武器。

理学又称道学，它继承和发展了孔老二的唯心主义“天命观”，把董仲舒宣扬的那套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的“三纲五常”哲学化，拚命鼓吹“天命即是天理”，把世界万事万物都说成是由所谓“理”派生的（“宇宙之间，一理而已。……其张之为三纲，其纪之为五常，盖皆此理之流行，无所适而不在”。），把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看做是永世不灭的（“三纲五常，礼之大体，三代相继，皆因之而不能变”）。朱熹的这套反动说教，其目的，无非是想证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所谓“合理性”和“永恒性”。他还说：“孔子所谓克己复礼；《中庸》所谓致中和，尊德性，道问学；《大学》所谓明明德，……圣人千言万语，只是教人存天理，灭人欲”^②。所谓“天理”，就是指的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；所谓“人欲”，就是指的人们违反纲常伦理的生活欲望。因此，

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就是要巩固封建统治的全部秩序，取缔破坏这种秩序的一切行为。换个说法就是：压迫剥削有理，必须使之“存”；起义造反有罪，必须使之“灭”。这充分暴露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极端反动的阶级实质。

儒学经过朱熹的加工发挥和注释，使孔孟之道更加理论化、系统化和通俗化，具有更大的腐蚀性、欺骗性和危险性，更适合于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，适合于近代和现代的反动派如曾国藩、蒋介石之流的需要，同样也适合于卖国贼林彪搞倒退、搞复辟的需要，从而成为宋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以及一切反动派头子的御用哲学。

朱熹这帮道学家们，明明“以理杀人”（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批判朱熹的话），却又伪装善人。他们按照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，罗织了一套阴险奸诈的处世哲学，表面装得“道貌岸然，满口仁义道德”，实际上却是寡廉鲜耻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这就是林彪所津津乐道的朱熹处世哲学的主要特征。自我标榜为“明人伦，讲圣言，通世故”的朱熹，就是一个十足的矫言伪行的两面派、伪君子。为了夺占建阳县学这块“侯王风水地”，就是这个朱熹根本不顾什么“人伦”，什么“圣言”，什么“世故”，竟然把他的祖宗孔老二的“圣象”，用粗绳巨索，捆绑手脚，从县学里搬了出去。他口口声声要“修己以敬”、“革尽人欲”，但实际上却官迷心窍、追名逐利、谄害攻讦、无所不为，甚至干出引诱尼姑为妾^③，这等乌七八糟的事来。可见他那一套什么“德”呀、“仁义”呀、“忠恕”呀，统统是自欺欺人的鬼话。明朝思想家李贽，曾经淋漓尽致地戳穿了这帮道学先生的画皮，怒斥道：“真个道学，脸皮三寸”^④！可是林彪却把朱熹的这一套视为至宝，胡说什么这是“历史唯

物主义”，是“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”。这就充分说明林彪与孔孟、朱熹统统是一丘之貉。由此可见，林彪出于“克己复礼”的反革命需要，拣起朱熹这套极端虚伪而又极端反动的处世哲学，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“法宝”，这就绝非偶然了。

二

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两面派林彪，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反对马克思主义、大搞修正主义，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在组织上结党营私，大搞分裂；在策略上要两面派，大搞阴谋诡计。他的一套反革命权术，追根溯源，就是从孔孟、朱熹那里拣来的破烂。概括起来，主要有三：

一曰：以屈求伸。

孔老二为了复辟行将灭亡的奴隶制，早就提出“以屈求伸”的反革命策略。被捧为“理学大师”的朱熹，又替它涂上了一层玄理的色彩。他解释说：“尺蠖屈，便要求伸；龙蛇蛰，便要存身。精研义理，无毫厘丝忽之差，入那神妙处，这便是要出来致用”⑤。很明显，他们的所谓“屈”，正是为了“求伸”，所谓“蛰”，正是为了“存身”，归根结底，是为了“致用”。这是一种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保护现在的生存，以利将来的发展的反革命策略。林彪对孔老二和朱熹这番狡猾的说教，心领神会，欣赏备至。因此，他时刻提醒自己及其死党：为了“致用”，要“屈”，要“蛰”，要“勉从虎穴暂栖身”。一九七〇年三月，正当他们加紧荫蔽斗争，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时刻，林彪对他的死党面授“韬晦”（晦）二字，并记在他的黑笔记上。这是林彪要“以屈求伸”，“以蛰存身”的最好注释。一旦认为

时机成熟，他就要“伸”开来，跳出来，发动政变，抢班夺权，以达其“致用”的目的了。

二曰：忍耐。

早在一九六三年，林彪就在他自己的黑笔记里特意写下“忍耐”二字，并告诫自己“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，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。”所谓“大事”，就是“克己复礼”，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。林彪的所谓“忍耐”，也是从孔老二、朱熹那里学来的。孔老二为了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，一生东奔西走，到处碰壁，挨揍受骂，“累累如丧家之狗”，就是为了实践他的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的信条。朱熹注解：“小不忍，如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，皆是。”接着，他又进一步发挥说，项羽没有听从谋臣范增的话，没有在鸿门宴上把刘邦杀掉，是“妇人之仁”，终于“乱”了“大谋”，使自己在楚汉争霸中归于失败（“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，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，皆能乱大谋，如项羽是也）。在另一个地方，朱熹之流把“小不忍”的危害性说得更加严重：“凡人之情，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。……竟有以一朝之忿不能自制，而被遣丧身者，不可不戒也”⑥。林彪曾把苏轼在《留侯论》中吹捧张良的一段话：“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骤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，写成条幅，挂在床头，正是为了避免“以一朝之忿不能自制而被遣丧身”的“自戒”。他要象张良那样“忍耐”，“不惊”、“不怒”地等待时机，以求一逞。当林彪的复辟阴谋开始败露时，他与死党互相告诫“要沉住气”，用“忍耐”来掩护暂时的退却。他还给露了马脚的死党打气说：即使被“撤下来，暂时靠边站”，也要“忍耐”，“不能乱说乱道”。林彪一伙就象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，要